

苦味人生不自哀——寫在父親洪深去世五十五周年之際

(接上頁)父親在美國從文科轉學戲劇,這個本源于“痛苦”的轉向,是父親人生無奈的選擇,不過不是消極的選擇:父親不僅相信自己具有從事這種工作的天賦和能力;而且相信,戲劇也是一種“喚起民衆”的有意義的事業。

追求一個民主光明的中國,是父親的理想,是他一生奮鬥的主線。況且,父親潛意識中和民國“罪人”我那“反動”爺爺“劃清界限”的思想,對他人生理想的這種追求和努力,客觀上也是種促進。父親向左翼的逐步靠近,以至甘當衝鋒陷陣的“排頭”兵,正是父親這種人生追求在現實社會的自然發展。然而事實卻很殘酷,父親發現:不管自己如何真誠奉獻、怎樣忠誠於自己的追求,而且始終積極努力地、實實在在為這種追求苦幹着,可是自己根本就不被左翼真正信任和接受。父親因為自己並不被“革命”所認可,既痛心也曾絕望。

一九四一年二月,發生了父親和母親一起“自戕”事情。後雖獲救,但此事在當時社會仍引起某種“震動”:父親“事業生活一切都無辦法”的遺言,成為輿論“大學教授無法生存”對國民黨政府時政抨擊的有力證據。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從一位可信任的長輩那里,我得知了此事又一種——我有理由深信不疑的——說法:一九四一年一月,國民黨策劃了“皖南事變”,隨之中國共產黨啓動旨在保存力量的“應變”計劃,其中包括對時在重慶的左翼進步文化人士分批撤離的安排。該計劃中沒有父親,父親也不知道有這個計劃。後來,父親得知此事,特別是父親知道了不少文化人都很“不以為然”的某某人竟“赫然在列”時,父親從失望進而到絕望的痛徹心肺的苦痛到了極點。父親沉痛地對某叔叔說:“像××這樣的人都……!他們不相信我!”陷入絕望的父親,一定是感到自己的人生已無路可走,隨後才會有“絕別”人世的決心。

我曾經因為父親兩次做了“官”,違背了自己的初衷:“第一,我這輩子絕不做官;第二,我絕不跟那些上層社會的人去打交道。”因此很為父親感到“遺憾”。

其實父親生命中更多時間,是個遠離官場的教書先生。但父親卻兩次接受了叫他做官的“召喚”,儘管父親這兩次做的都是小官——中

的政治部。郭沫若任政治部下設的第三廳廳長,田漢是三廳六處少將銜處長。其時,父親正帶領“上海演劇救亡第二隊(乙組)”在襄樊進行宣傳,當父親接連收到田漢要父親立即趕赴武漢卻未明說緣由的急電後,毫無遲疑地立即趕去了武漢,和接受了三廳六處戲劇科(即第一科)上校銜科長的職務。

政治部三廳戲劇科,由當時在武漢的全國救亡戲劇宣傳隊伍整編成的十個抗敵演劇隊和一個《孩子劇團》組成,他們是當時國統區抗日戲劇宣傳的基本力量,父親是這支宣傳隊伍的重要組織者和主要管理者。父親沒有留守在安全的後方,他和演劇隊一起奔赴實地身體力行地進行抗戰救亡宣傳。一九三八年,父親組織上百人演劇宣傳隊到農村進行宣傳,他本人也隨同《湖北楚劇宣傳隊》一起下了鄉。同年九月,父親率領演劇隊,乘木船驚險渡黃河北上進行宣傳。父親在《在鬥爭中成長》一文提出的:“抗戰以來,我們的戲劇界同志從鬥爭中把自己強大起來。更重要的,他們懂得了內地農村生活實況。戲劇的鐵軍就是這樣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也是父親對自己抗戰救亡宣傳工作的一種總結。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父親不計個人一切:家庭、大學教授“頭銜”,已有的社會地位,……抱着奮不顧身的精神投入到了抗戰救亡運動中。父親是為了抗戰救亡宣傳工作,才做了這個“戲劇官”。父親不無苦味地“自嘲”道:“為遠離‘官’而搞戲,但抗日救亡的需要,則是為了‘戲’而‘做官’。”抗戰中,父親是“兢兢業業做‘戲劇官’。”抗戰勝利後,父親就重回《復旦大學》任教。父親說:抗戰勝利後他與他做的這個“戲劇官”是“要永別之”,“但願永不再做官”了。父親這第一次做“官”,我能理解也能接受。

父親第二次做“官”,要從父親20世紀30年代初閱讀了一些社會科學書籍,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新的認識說起。父親在追求更進步更合理社會的思想狀態下,開始了和左翼的接近:1930年,父親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和“左翼劇團聯盟”,在文化工作中公開站在了左翼。當時,父親對科學共產主義不可能有深刻認識,他也不關注政治黨派間的鬥爭,父親只是在文化態度上站在了“左翼”,但他不願意、亦不會參加到實際的政治鬥爭中去。父親這種態度和立場,讓政治鬥爭無論的那一方,都不喜歡,亦不信任。

一九三七年,父親帶領《上海演劇救亡二隊》到達洛陽。國民黨駐軍首領問父親:“有沒有去西北(指延安)的打算?”父親引唐詩人王維詩句:“西出陽關無故人”予否定回答。近半個世紀之後,當時和父親同在《上海演劇救亡二隊》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金山先生,撰文回顧了這段往事。金山先生在文章中並不迴避地談了當時他對父親立場態度的不滿:作為《上海演劇救亡二隊》內的中共地下黨,他在向主管周恩來彙報時,對洪深表示“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態度,認為是有問題的。這多少也表明,那時共產黨員是怎麼看父親的。

一九四五年秋,抗戰勝利。一九四六年,國內形勢從政治鬥爭演進到國內戰爭,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非左即右”不是共產黨就是國民黨的社會。在意識形態“對立”愈來愈劇烈的社會里,“文化”無法真正獨立于外。

抗戰勝利後,父親不斷遭到國民黨政權力量的公開迫害。一九四六年,在重慶北碚《復旦大學》,父親“因反對特務學生對進步同學壓迫脅持《谷風》壁報事件,每夜有持槍者包圍住所,作精神上迫害幾近一個月,雖堅決挺持,而本人後腦神經系統發炎,兩耳失聰,均於此時加重。”一九四七年,在

上海江灣《復旦大學》,父親又因“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學生反飢餓反迫害運動中本人支持進步學生,被反動分子持槍威脅、毆擊前後七、八次。”

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全市學生進行反內戰反飢餓大遊行,並在校內舉行活動,隨後由學生運動開始向全市各個階層延伸、深入。在《復旦大學》教師和員工會上,父親痛斥國民黨政府對學生打擊和鎮壓的暴行,並建議全校教授罷教和向政府提出嚴正抗議;與會教授在罷教宣言上簽字,以《復旦大學》教授名義發表通電,向全國控訴政府這種罪行。國民黨政府窮途末路之際的這種變本加厲作為的結果,讓父親、也讓許多有民主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乃至痛恨。

一九四八年春,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中,遭到《復旦大學》變相解聘的父親,接受《廈門大學》外文系聘任,帶著我們全家從上海到了廈門。同年年末,父親接受中國共產黨邀請,以醫治牙齒為由從廈門只身到了香港。一九四九年一月,在中國共產黨安排下,父親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從香港乘蘇聯輪船到東北大連港。五月,父親到北京。九月,父親被共產黨安排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參加在北京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

父親把中國的希望寄望於共產黨,他也把自己對國家的赤誠之心奉獻給了共產黨。這應該是父親必然的選擇吧!當然,父親未必想到:他就此也失去了自己最後的那點“獨立”性。

母親告訴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父親準備回到上海《復旦大學》繼續教書工作。但周恩來則要父親留在北京工作,因此父親便在北京做了“官”,直到去世。

父親“官”任的《政務院對外文化事務聯絡局》,是個純粹事務管理性質的行政機關。一九四九年《對外文化事務聯絡局》首任局長,是國際文化工作者、著名詩人蕭三。蕭三是老資格共產黨人,亦是毛澤東的大同鄉。讓父親做蕭三的副手,實際具體的事務性的事情,顯然就是要父親來做。父親的工作,很繁雜,很瑣碎。有參與我國和友好國家文化交流計劃制定,以及計劃實施操作等比較重要的事;也有具體的事:如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大會,包括有關禮儀在內的諸多事情,……等等。工作中事無大小,父親都要親力親為地安排、去督促、去檢查落實。“關照好”外賓,也是父親的工作:外賓來,父親去迎;外賓走,父親去送;外賓觀看文藝表演,父親陪同看……;時年過半百的父親,還陪同來訪的外國藝術團體,一起參加首都的五一遊行。

工作繁重、事情瑣碎,還有無章可循、無序的工作環境,都沒有妨礙父親做好並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務。但父親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甚至連個民主黨派也不屬的“政治身份”,大概才是他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難”。父親“無黨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時,也許還有點用處;但在執政黨領導的政府中,這個不是“自己人”的身份,沒有積極作用。

父親工作“處處用心,時時小心”,但仍然不時遭到批評。父親不是不接受批評,亦不是不敢承擔責任,父親是不明白:為什麼遭受“指責”的,總是做了工作又完成了任務的自己呢?!父親缺乏“官場歷練”,但父親的直覺“警告”他:一定要無條件接受對自己的任何批判,那怕僅僅是說明情況,也會招來“缺乏為人民服務態度”的嚴重後果。父親清楚,自己是個渾身上下都屬於“舊時代”的人,是個要徹底改造的“舊知識分子”。於是,父親把自己所有的鬱悶和痛苦,都隱忍於心,不敢流露出來。父親苦自己,自己受折

磨,讓心靈和精神承受着重壓。

當父親連捍衛自己內心自由都那麼艱難時,不知父親是否意識到:他爭取和捍衛的國家民主、他追求的民衆自由,有多麼遙遠。

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後,父親在那個“官”位上誠惶誠恐地做着事,他根本沒有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適宜條件。其實,除了沒有時間和精力外,現實社會的種種,也讓父親明白:自己在文學藝術創作工作上恐怕是“力不從心”了。

一九五三年六月洪深致周揚短箋。當然,父親不是完全置身于文學藝術事物之外。一九五三年,郭沫若創作的話劇《屈原》由領導組織進行集體修改。父親參加了此項劇本修改工作,他在向主管周揚送交自己修改過的《屈原》劇本時,附有一封彙報短信。從短信和送交的修改了的劇本來看,父親不僅對領導佈置的任務態度認真,父親做事也是“小心翼翼”。

短信內容是:

“周揚副部長:
「屈原」劇已依個人見解,刪改了三處。改的句子比較少——因欲儘可能地保存原文——而刪去的相當多——但仍望可不減其精彩。送上刪本,供九人小組其它組員的參考。

此致
敬禮
六月二十一”

一九三〇年,那個曾在上海《大光明電影院》面對美國辱華影片《不怕死》奮起揮臂、高呼抗議的父親;

一九三七年,那個曾經在“廬山教授座談會”上堅決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的父親;

一九三八年,那個在武漢當面斥問汪精衛為什麼不抗日的父親,已經不再有了。

現實就是這樣地“改造”了人——磨去“個性”,攝去“魂魄”!

為抗日,父親一九三八年,在國共合作的政治部三廳做了個“上校銜戲劇科長”,當了“戲劇官”。為戰後中國的建設,父親一九四九年做了個“副局長”職的“對外文化聯絡官”。父親兩次做“官”,不論是“戲劇官”,實質上,都是父親無條件聽從共產黨安排,做了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基層行政事務管理工作的“官”。

我對父親“不做官”的“食言”,已經釋然。其實父親自己又何嘗不明白呢,父親在《戲劇官》一文中寫道:“七年來最大打擊,乃當日我為抗日做官,遂以為所有

其他的人亦必如此;而逐漸發現,事實殊不盡然;我不能不自笑‘天真’。”真正“遺憾”的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難免會有“身不由己”的無奈之時,面對這種無奈,我們真的很無力。如同隨水而動的一滴水,我們不知道自己在人生之河的什麼地方停滯消失,我們並不能真正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歸宿。不論父親留在北京,還是回到上海;不論父親教書,還是做“官”。父親不論在什麼地方,不論做什麼工作,他仍然都還是身處在“官本位”大磁場的情感作用控制下。

一個人生命的長或短——六十年的人生或一百年的人生,在浩瀚的宇宙中,幾乎毫無區別。人在世,活得問心無愧,活得於人類社會有貢獻,也就不枉活了一生。父親說:“我覺得我對於戲劇,研究了多年,略有心得,我對於後人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我研究所得寫出來,庶及以後從事戲劇的人,不必像我這樣吃苦費力。”父親做到了,並且做得很好。

苦味人生不自哀,父親對待人生積極進取的勇敢態度,父親在人生路上挺立著,一步一步向前進的人生實踐,深深觸動了我、教育了我、並且一直激勵著我。父親伴我一生。

二〇一〇年一月寫于上海



洪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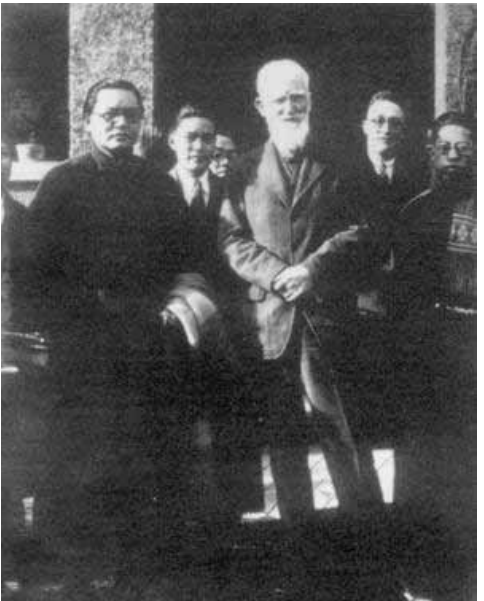


洪深在青島的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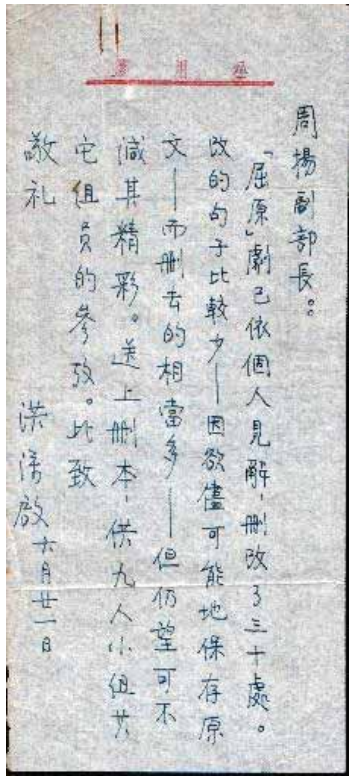
層幹部而已。但父親為“官”的現實,卻讓我內心長期無法趨于平靜。我不止一次問自己:“如果父親不曾踏進‘官場’,如果父親始終堅守在文化學者、大學教授的崗位,沒有和‘官場’發生直接的關係,父親一生會不會是另一種生命狀態?!父親是不是就不會在壯年的六十歲,離我們而去!?”

一九二二年春,父親自美國留學歸來,開始了他在大學執教的工作。父親先後在上海的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廣東的中山大學、青島的山東大學、福建的廈門大學等學校教書,他從來沒有想過要中斷這種教書工作。一九三七年夏,父親利用中山大學暑假,從廣州到上海參加話劇《保衛蘆溝橋》導演工作。但隨即發生了“八·一三”戰事,父親來不及回廣州安排家人,就率領“上海演劇救亡第二隊”從上海出發,走向了全民抗戰的戰場。離開上海前,父親把書寫的遺書交給他《復旦大學》的同事和朋友顧仲彝先生,並對顧先生說:“萬一戰死疆場,要按照遺囑辦。這不是消極的命運觀,而是積極的犧牲準備。”父親在《悼念趙曙同志》文章里寫的:“這種槍林彈雨中從事精神抗戰者的任務,可使戲劇工作的同志們重新看清自己的任務,更勇敢地加強決心與工作。”亦是父親自己的抗戰“宣言”:公開表示不畏犧牲抗戰到底的決心。

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二次公開合作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成立了以陳誠為部長、周恩來為副部長



洪深與蕭伯納的會面



周揚副部長:
「屈原」劇已依個人見解,刪改了三處。改的句子比較少——因欲儘可能地保存原文——而刪去的相當多——但仍望可不減其精彩。送上刪本,供九人小組其它組員的參考。
洪深啟 六月廿一日



1924年洪深編導的《少奶奶的扇子》